

# 記夢、謁墓與前身——唐宋人學杜的情感 路徑

廖美玉\*

## 摘要

由唐入宋，杜詩逐漸發展成為顯學，學杜成為詩壇主流，注杜、論杜與學杜的討論空間很大。不同於歷來詩學建構著重在理論與概念的分析，本文嘗試從記夢、謁墓與前身等情感徑路切入，探究不同於詩壇主流的詩學議題如何被提出？如何與相關文本、詩話形成互文或對話關係？對建構學杜的詩學譜系又有哪些開展？文中首先闡發唐代詩人以記夢、謁墓表達對杜甫的心馳神往之情，揭櫫杜詩的廣闊性與多元性，開啟了唐以後學杜的蓬勃發展。其次探討宋人記夢、謁墓之作所側重的輯逸、箋注、考據等具體層面，使杜甫其人與其詩相互推激而攀登上詩歌史上的高峰，確立杜甫「詩聖」與「詩史」的地位。再就宋人另外選擇以前生／前身的方式，破解唐宋人在議論與考證上的糾葛，避免使「學杜」流於過度浮泛，使學杜的詩學議題呈現出更為繁富的多元面向。

關鍵字：學杜、記夢、謁墓、前身

---

\*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

# The Records of Dream, Paying Respect to Du-Fu's Grave and Predecessor — the Emotional Path of Learning Du-Fu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

Liao Mei-Yu  
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 
Feng Chia University

## Abstract

With the passing of the Tang Dynasty into the Song Dynasty, Du-Fu poetry gradually emerged and learning Du-Fu poetry became the mainstream in the poetic world, creating room for the discussion, interpretation, and learning of Du-Fu poetry. Differing from past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y and concept of past studies, we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rise of non-mainstream poetry and the emotional path of learning Du-Fu via dream records, Du-Fu grave tributes, and predecessors. Additionally, we also discuss the dialog relations with the text and notes of poetry,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etic genealogi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learning Du-Fu poetry. We first elaborate the affection for Du-Fu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by the dream records and Du-Fu grave tributes, revealing the extensiveness and diversity of Du-Fu's poetry, and establishing the rigorous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Du-Fu poetry after the Tang Dynasty. We then explo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and textual criticism in Song Dynasty dream records and Du-Fu grave tribute which allowed for the rise of Du-Fu's person and poetry, establishing Du-Fu's position as a "Poem Saint". Finally, we explore how Song Dynasty scholars avoided conflict in the discussion and over-interpretation of learning Du-Fu poetry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y utilizing the concept of pre-life/predecessor/afterlife, allowing the subject of learning Du-Fu poetry to display rich

multi-dimensionality.

**Keywords: Emotional path, Learning Du-Fu, Dream records, Du-Fu grave tributes, Predecessor, Genealogy, Poem Saint, Tang and Song Dynasties**



# 記夢、謁墓與前身——唐宋人學杜的情感路徑

廖美玉

## 一、前言

一般而言，詩學的建構，主要是就理論與概念進行分析，特別是訴諸詩學史中經典作品的權威性，再引述前人相關文本、詩話以為佐證，透過歸納、闡述與評論，有助於建立系統性的詩學論述。而本文則意圖在傳統徑路之外，另覓非屬理性分析的記夢與謁墓與前身等情感徑路。情感之所以被歸類為無理性（arational）或非理性（irrational），在於情感無關正確或不正確，也很難被視為直接的知識，但情感又是認識對象的一種常見方式，因此，如何看待學杜的情感徑路，涉及到唐宋人學杜的根源，是因為發現杜詩有值得學習之處呢？還是因為推尊杜甫而學習他的詩呢？前者係經由客觀分析而闡發杜甫所具有的典範條件，而後者則著重在主觀上杜甫所具有吸引人的情感特性。藉由記夢與謁墓等情感徑路所透顯的詩學觀念，探究不同於詩壇主流的詩學議題如何被提出？如何與相關文本、詩話形成互文或對話關係？對建構學杜的詩學譜系又有哪些開展？值得進一步討論。

杜甫在以詩賦取士的年代，一生以詩為志業，不論是力求仕進的京城時期，或遠走他鄉的流離歲月，其所見、所聞、所思、所感，畢見於詩。甚至選擇以「戲」為題，嘗試探問以詩歌創作獨立於政治場域之外的可能性。在詩歌史上，杜甫既是一位集大成詩人，又是具有積極開拓性的「先行者」，在詩歌發展的典範性、延續性與創造性上，引領出唐宋詩風的多元繽紛，固然獲得崇高的詩學地位，卻也引發波瀾壯闊而又歷久不衰的詩學論爭，筆者已有〈杜甫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意義與效

應〉一文加以討論<sup>1</sup>。宋人學杜發展的蔚為風潮，又因個人情性與遭遇而呈現多元面向，筆者對此撰有〈東京與兩川——王安石、黃庭堅學杜的兩種視角〉一文<sup>2</sup>，可供參閱。惟宋人學杜主流的江西詩派，主要詩學理論係放在語言結構的網絡上來討論，講究聲律、對偶、辭藻，在立意、用事、琢句、謀篇上用工夫。本文乃嘗試在主流與理性、技術性之外，探尋唐宋人學杜在情感性耽溺上所提供的訊息。

## 二、記夢所映現的詩學意涵

無論古今中外，企圖透過神祕的夢境，尋覓被刻意隱藏起來的情感，進而發掘內在更多的情思意念，揭示更多無法或尚難被接受的觀念與思考徑路。佛洛伊德即指出夢境內容乃以現實生活經歷為展演基礎：

組成夢的內容的所有材料都是以某種方式來自於個人的經歷，又在夢中浮現或回憶起來。……以我個人的經驗觀察夢內容中的各種元素的起源，我立刻就可以斷言，它們在做夢前一天的經驗中一定能找到接觸點。<sup>3</sup>

夢境內容反映了個人現實生活，也表達了人的潛在欲望。自古以來有關夢的記載與解釋極多，在唐宋尤有顯著的進展，除了傳統的夢兆之外，夢的呈現更為多元，尤著重在現實缺憾的獲得彌補，如唐小說中的三夢，以詩記夢亦然，白居易〈寄行簡〉即云：

鬱鬱眉多斂，默默口寡言。豈是願如此，舉目誰與歡。去春爾西征，從事巴蜀間。今春我南謫，抱疾江海壖。相去六千里，地絕天邈然。十書九不達，何以開憂顏。渴人多夢飲，飢人多夢餐。春來夢何處，合眼到東川。<sup>4</sup>

<sup>1</sup> 收入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總第94期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.6，頁37-72。

<sup>2</sup> 收入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第6輯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.6，頁203-222。

<sup>3</sup> 詳見佛洛伊德著：《釋夢》，收入車文博主編：《弗洛伊德文集》（長春：長春出版社，1998.2），頁253、381。

<sup>4</sup> 詳見白居易撰，朱金城箋校：《白居易集校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.12），卷10 頁558-

居於「渴人夢飲，飢人夢餐」的補償作用，白居易對於兄弟間的聚少離多，只能藉由夢中探望來滿足情感上的缺憾，反映出夢具有個人經驗的記憶與本能的渴望。黃庭堅仿之而作〈謫居黔南十首〉之十云：「病人多夢醫，囚人多夢赦。如何春來夢，合眼在鄉社。」<sup>5</sup>則更進一步呈現夢經由擬作的共振而具有社會文化背景<sup>6</sup>，可見夢境同時具有個人化特徵與時代共通性。蘇軾〈次韻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〉首揭「饑人忽夢飯甑溢，夢中一飽百憂失。只知夢飽本來空，未悟真饑定何物。」<sup>7</sup>以夢中獲得的滿足感畢竟是空，如何承受、消解現實窘境？才是人所要面對的。在近人研究上，楊玉成在〈文本、誤讀、影響的焦慮——論江西詩派的閱讀與書寫策略〉中，對宋人一再記載夢中出現杜甫詩句，藉布魯姆（Harold Bloom）所謂影響的焦慮（anxiety of influence）來解釋，云：「杜甫夢是宋人集體意識的投射，突顯杜詩崇高神聖的地位，也顯現另一種潛意識的風景：詩人被魅影化，在遙遠的過去陰魂不散，侵入後人世界。」<sup>8</sup>本文則以唐宋詩人的學杜之夢，可依時代背景與詩學主張之不同，分別出現夢兆、心馳神往、摘句、續詩、輯逸、解詩與教學等豐富意涵。

### （一）夢杜所反映的創造力

有關夢的研究指出：對於某些尚難以用抽象概念呈現的論述，常以形象化的方式出現在夢中，成為「含義豐富」而具有洩露潛在意識的特質，克里普納等人稱之為「在夢中以創意解決問題」，云：

把夢的活動和影像看成寫實的表現或隱喻、象徵，就可以在夢中以創意解決問題。不論在哪一種層面，夢都是反映創造力的綜合過程，夢會綜合大

559。

<sup>5</sup> 見黃庭堅撰，任淵、史容、史季溫注：《黃庭堅詩集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.5），卷 12 頁 446。

<sup>6</sup> 戴維·方坦納（David Fontana）著，李潔修譯：《夢境的例句》即指出：「反映出夢者本能的興趣和記憶，與夢者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強烈的共振。」（臺北：知書房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84。

<sup>7</sup> 見蘇軾撰，孔凡禮點校：《蘇軾詩集》（臺北：莊嚴出版社，1990.10），卷 21 頁 1121。

<sup>8</sup> 詳見氏著〈文本、誤讀、影響的焦慮——論江西詩派的閱讀與書寫策略〉，收入《建構與反思：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2.7），頁 364。

腦各部位的活動和各種夢境內容的來源。<sup>9</sup>

一般的詩話、箋釋等詩學專著，大抵是經過廣泛閱讀後加以歸納、分析與考證所提出的詩學主張，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與概括性。而在提出具有理論性的詩學專著之前，或受限於時代風潮的龐大壓力，或個人的覺知尚未發展成型，因而在現實中還無法以理性論述呈現，乃藉由夢境容許無理、零碎與創意的特質，把包含相容或不相容的各種資訊夾雜呈現，就成了「反映創造力的綜合過程」的珍貴線索。以此來看孟郊的〈戲贈無本〉，詩云：

天高亦可飛，海廣亦可源。文章杳無底，斲掘誰能根。夢靈髣髴到，對我方與論。拾月鯨口邊，何人免為吞。燕僧擺造化，萬有隨手奔。補綴雜霞衣，笑傲諸貴門。（其二，節）<sup>10</sup>

杜甫在〈戲為六絕句〉中提出「清詞麗句必為鄰」與「或看翡翠蘭苕上，未掣鯨魚碧海中」的不同詩風<sup>11</sup>，大歷十才子延續既有的「清詞麗句」、「翡翠蘭苕」而成為安史亂後的詩壇主流，韓愈與孟郊則揭櫫「鯨魚碧海」的怪奇詩風，並且不約而同地選擇以「夢」來發言。孟郊賦予詩歌創作一個廣漠無垠的宇宙時空，並以「夢靈」的主動介入，為自己的詩學主張背書，更進一步以鯨口拾月比擬詩人的冒險嬉遊，除了要有足夠的膽氣，還得有「免為吞」的矯捷身手，並以賈島為例，呈現出擺弄造化、驅遣萬有、笑傲權貴的創作姿態，韓愈〈送無本師歸范陽〉詩亦云：「無本於為文，身大不及膽。吾嘗示之難，勇往無不敢。蛟龍弄角牙，造次欲手攬。眾鬼囚大幽，下覩襲玄窩。天陽熙四海，注視首不鎖。鯨鵬相摩宰，兩舉快一啖。」（節）<sup>12</sup>都突顯出詩人目空一切、肆行無礙、隨意揮灑的高逸身影。可見夢雖然反映了人的現實經驗，畢竟與現實是兩個不同的世界，孟郊由此所映現或隱喻

<sup>9</sup> 詳見克里普納 (Stanley Krippner)、柏格沙朗 (Fariba Bogzaran)、迪卡瓦荷 (André Percia de Carvalho) 著，易之新譯：《超凡之夢：激發你的創意與超感知覺》（臺北：心靈工坊文化，2004.11），頁 53。

<sup>10</sup> 見清聖祖御編：《全唐詩》（臺北：盤庚出版社，1979.2），卷 377 頁 4235。

<sup>11</sup> 詳見杜甫著、仇兆鰲輯：《杜詩詳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0.7），卷 11 頁 898-902。本文引用杜甫詩文凡出本書者，為避繁瑣，採隨文標示。

<sup>12</sup> 詳見韓愈撰，錢仲聯集釋：《韓昌黎詩集繫年集釋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7），卷 7 頁 359。

的，是詩歌雖然也反映現實世界，畢竟與體國經野、制度嚴備的政治場域有所區分，詩人的自主性與開創性均非政治權勢所能拘限，從而詩人所形塑的詩歌世界，自然遠比現實世界更為遼闊而深邃。

對於賈島在詩歌創作上所開拓的世界，孟郊在詩中以「可惜李杜死，不見此狂癡」，透顯出詩人創作的不相拘束、各自精彩。與孟郊在詩學理念上相互呼應的韓愈，對杜甫乃直接以信徒恣態，在〈調張籍〉<sup>13</sup>中展現心嚮往之的虔誠：

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……伊我生其後，舉頭遙相望。夜夢多見之，  
晝思反微茫。（節）

對於李白、杜甫所展現的創作成果，韓愈藉由夜夢與晝思透顯出後來者的狂熱與焦慮：不斷在夜晚夢中出現的清晰身影，在白日清醒時刻反而顯得模糊。夜夢的特質，除了反映現實記憶，還具有引動人的潛意識的功能，如魯道夫·阿恩海姆所云：

在睡覺的時候，人的意識下降到了一種較低的水平，在這一水平上，生活情景並不是以抽象的概念呈現出來的，而是通過含義豐富的形象呈現出來的。<sup>14</sup>

當人處於睡眠狀態時，意識活動呈現休止狀態，因而降低了社會制約與自我管束的影響力，使夢中的自我獲得比較大的展演空間。是以韓愈在白日的思考，免不了要受到社會主流思潮的牽制，在詩歌創作活動上自然無法暢所欲言，因而藉由一再出現在韓愈夢中的李杜，清楚地映現出韓愈在詩歌創作上亟欲擺去拘限的內在渴望，並且以「含義豐富的形象」呈現出來：

徒觀斧鑿痕，不矚治水航。想當施手時，巨刃磨天揚。垠崖劃崩豁，乾坤  
擺雷礮。惟此兩夫子，家居率荒涼。帝欲長吟哦，故遣起且僵。翦翎送籠

<sup>13</sup> 宋魏泰、周紫之以來，多以〈調張籍〉乃「為微之發」，常思春〈韓愈論李杜芻議〉則以為：「韓愈〈調張籍〉詩絕非針對元、白而發，亦絕非作在元和年間，而當是貞元十三年（797）冬或十四年（798）春韓愈在汴州與張籍初相識相交時的論詩之作。」（杜甫研究學刊 2005 年第 4 期，頁 28-36），本文從常說。

<sup>14</sup> 〔美〕魯道夫·阿恩海姆（Rudolf Arnheim）著，騰守堯、朱疆源譯《藝術與視知覺——視覺藝術心理學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01.3），頁 630-631。

中，使看百鳥翔。……我願生兩翅，捕逐出八荒。精誠忽交通，百怪入我腸。刺手拔鯨牙，舉瓢酌天漿。騰身跨汗漫，不著織女襄。<sup>15</sup>

韓愈藉由夜夢所映現的李杜詩學，完全不同於「詩言志，歌永言」、「詩緣情而綺靡」、「雅潤爲本」、「清麗居宗」等傳統詩學，詩人的形象顯得更爲豐富：一方面以開天闢地的巨人恣態出現，揮舞著巨刃利斧，每一道的鑿刻都伴隨著如雷鼓般巨響；另一方面又以剪翎籠鳥的落難者恣態呈現，失去了飛翔能力，只剩下想飛的原始欲望。這兩種形象交織成無限的張力，既擁有雷霆萬鈞之力而又完全束手無策，使「詩人」的含義同時具有無畏無限與不捨不悔的豐富蘊涵。是以身處當代、深諳社會主流風尚的韓愈，在詩歌創作上容許自己變化成異類，以大鵬鳥的恣態追逐著無限的可能。藉由夜夢，韓愈乃得以悖離傳統詩學而發展出「以醜爲美」、「怪奇」的詩歌創作路線，後繼者李賀更進一步穿幽入仄，瑰麗奇譎，悖離詩之常軌，成了如余光中所言：「可說是一位生得太早的現代詩人」，在詩歌史上留下「永遠的先驅者」<sup>16</sup>的身影。

## （二）摘句與續詩所映現的詩學議題

中唐之後詩人夢杜的發展，出現了對杜甫特定詩句的記憶，進而衍生「夢兆」與「續詩」兩種特質。前者乃描述夢中所得杜甫詩句，符應到現實的遭遇，突顯出杜詩的神祕性預言能力；後者則將夢中所得杜甫詩句發展成篇，甚至有能完整記憶夢中詩者。兩者都意謂著詩人特別留意夢杜的內容，並且具有較強的夢境回憶能力，尤其藉由回想夢境進行創作時，往往有較多的發揮。如晚唐鄭顥（？-860）〈續夢中十韻·序〉：

去年壽昌節，赴麟德殿上壽迴，憩於長興里第，昏然晝寢，夢與十數人納涼於別館，館宇蕭灑，相與聯句，予為數聯，同游甚稱賞，既寤，不全記諸聯，唯有十字云：「石門霧露白，玉殿莓苔青」，用杜甫句。私怪語不

<sup>15</sup> 詳見韓愈撰，錢仲聯集釋：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7.10），卷9頁434-436。

<sup>16</sup> 詳見余光中〈從象牙塔到白玉樓〉，收入呂正惠編：《唐詩論文選集》（臺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85.4），頁386。

祥，書之於楹，不敢言於人。不數日，上不豫，廢朝會，及宮車上仙，方悟其事。追惟顧遇，續石門之句為十韻云。

比起孟、韓的藉夢發揮，鄭顥對夢境的記憶頗為周詳，對於人物、地點與聯句活動的描述，歷歷分明，至於詩句的記憶，則只剩下杜甫的「石門霧露白，玉殿莓苔青」二句，出自〈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〉，乃為睿宗陵墓而作，鄭顥以為不祥之兆，未幾而上崩。鄭顥以夢中出現的杜詩具有夢兆，突顯出杜詩的預言能力，更進而以杜甫詩句續成詩云：

間歲流虹節，歸軒出禁扃。奔波陶畏景，蕭灑夢殊庭。境象非曾到，崇巖昔未經。日斜烏斂翼，風動鶴飄翎。異苑人爭集，涼臺筆不停。石門霧露白，玉殿莓苔青。若匪災先兆，何緣思入冥。御爐虛仗馬，華蓋負雲亭。白日成千古，金滕闕九齡。小臣哀絕筆，湖上泣青萍。<sup>17</sup>

杜甫原詩為三十韻排律，前半寫睿宗橋陵，後半記縣內諸官。所夢詩句為第六韻，寫時光流轉中的帝王陵寢，兼具宏偉、精麗與荒涼等多重感覺，原作「石門霜露白，玉殿莓苔青」；鄭顥續詩仍置第六韻，以記夢的方式，藉由杜詩來預示帝王的駕崩，使帝王生死得以納入生命無常的自然法則。而藉由夢境以完成「續詩」的創作，更成為擬作、唱和、聯句之外的另一種詩人對話關係<sup>18</sup>。

詩話中常見的「摘句」批評，也出現在宋人的記夢之作中。錢易記載宋太宗雍熙年間（984-987），彭城劉景直遊華清宮，夢明皇召去，論當時事，未幾岐王至，並展開一場對話：

適杜甫到臣帳中，誦哥舒翰詩向臣，似有德色，云：「日月低秦樹，山河遠漢宮。」明皇又曰：常愛伊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」之句，李白終

<sup>17</sup> 見清聖祖御編：《全唐詩》（臺北：盤庚出版社，1979），卷 563 頁 6533。

<sup>18</sup> 藉由擬作展開與杜甫的對話者，如李商隱〈杜工部蜀中離席〉：「人生何處不離群，世路干戈惜暫分。雪嶺未歸天外使，松州猶駐殿前軍。座中醉客延醒客，江上晴雲雜雨雲。美酒成都堪送老，當壚仍是卓文君。」、〈河清與趙氏昆季讌集得擬杜工部〉：「勝概殊江右，佳名逼渭川。虹收青嶂雨，鳥沒夕陽天。客鬢行如此，滄波坐渺然。此中真得地，漂蕩釣魚船。」見馮浩箋注《玉谿生詩集箋注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公司，1983.11）卷 1 頁 361、頁 341。

無甫之筋骨，至如賈至、崔輔國，亦闕自然之句。<sup>19</sup>

宋人對夢境的記憶顯然更爲複雜，杜甫的出現係經由岐王轉述，耐人尋味的是，杜甫自誦「日月低秦樹，山河遶漢宮」二句，出自〈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〉，一開始即肯定唐玄宗與哥舒翰的君臣相得：「今代麒麟閣，何人第一功。君王自神武，駕馭必英雄。」所引二句詩原作「日月低秦樹，乾坤繞漢宮」，正是君臣相得之際的盛世景象。至於玄宗所誦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」，出自杜甫〈羌村三首〉之一，已是安史亂起、哥舒翰兵敗潼關後，肅宗至德二載（757）杜甫因疏救房琯而放還鄜州省家所作，寫亂後家人重逢的驚喜之情。夢中的玄宗更化身爲詩評家，以爲「李白終無甫之筋骨，至如賈至、崔輔國，亦闕自然之句」，以比較法突顯杜詩的有筋骨而造語自然。這一場夢境，同時映現出兩個詩學議題：一是杜詩已出現國事與家事的分類，一是出現詩人自許與讀者愛好的差異性。而宋人對杜詩的愛好，顯然是往家事書寫傾斜，如畢仲詢所記：

盛文肅夢朝上帝，見殿上執扇，有題詩云：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」，意其天人詩，識之。既寤，以語客，乃杜甫詩也。<sup>20</sup>

杜甫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」的詩句，再度出現在不同人的夢中，並且是題在執扇上，具有座右銘的自戒、自勵、自勉之意，甚至把杜甫推舉爲洞悉宇宙人生真理的「天人」<sup>21</sup>，恰可與宋人推尊杜甫爲「詩聖」相呼應。

### （三）夢杜在輯逸、解詩與教學上的意涵

在以上的夢境中，杜甫還只是配角身分，甚至只以詩句間接出現，宋人夢杜，還進一步由虛入實，著重在詩句箋釋、作品輯佚與句法。特別是唐代杜詩流傳不廣，散逸更多，如蘇舜卿於景佑三年（1036）編輯《老杜別集》，其《題杜子美別

<sup>19</sup> 詳見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卷 48。華文軒：《杜甫研究》（臺北：成偉出版社，無出版年月）。按：此書即《古典文學資料彙編：杜甫卷·上編》，頁 60。

<sup>20</sup> 詳見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六引《幕府燕閒錄》。《杜甫研究》，頁 133。

<sup>21</sup> 如〈天下〉篇云：「不離於宗，謂之天人。」詳見莊子撰，錢穆纂註：《莊子纂箋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74.10），頁 269。又班固：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：「臣謹案春秋之中，視前世已行之事，以觀天人相與之際，甚可畏也。」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.4），卷 56 頁 2498。

集後》即云：

杜甫本傳云：有集六十卷。今所存者才二十卷，又未經學者編輯，古律錯亂，前後不倫，蓋不為近世所尚，墜逸過半。吁，可痛憫也。<sup>22</sup>

因此，宋人在杜集的採編輯逸上頗費工夫，趙令畤（1051-1134）《侯鯖錄》記載狄遵度之夢云：

狄遵度，字元規……當楊文公崑體盛行，乃獨為古文章，慕杜子美、韓退之之句法，一夕夢子美自誦其逸詩數十章，既覺，猶記其兩句云：「夜臥北斗寒挂枕，木落霜拱雁連天」，因書其後曰：子美存耶？果亡耶？其肯為余來耶？嘿誦人未知之者，俾予知耶？觀其詞，蓋非他人所能為，真子美無疑矣。遵度因足成其詩，號〈佳城篇〉，不幸年二十為襄城簿而卒，詩云：「佳城鬱鬱頽寒烟，孤雛乳兔號荒阡。夜臥北斗寒挂枕，木落霜拱雁連天。浮雲西去伴落日，行客東盡隨長川。乾坤未死吾尚在，肯與螻蛄論大年。」<sup>23</sup>

北宋初期崑體盛行，杜甫尚未獲得足夠的重視，狄遵度乃藉由夢中杜甫自誦其逸詩，所謂「數十章」而僅存二句，可見輯逸的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。至於「觀其詞，蓋非他人所能為」，因而論定為杜甫所作，雖不免流於主觀性批評，亦可見宋人已體認到杜詩有其獨特句法。狄遵度所記憶的夢中句，並未收入杜集，續詩為七言八句，首句入韻，有對偶句，惟全詩古調、拗調並見，既失黏又失對。崑體七律已極圓熟，狄遵度續詩顯然有意以拗調對治圓熟，特別是年未二十而詩意寒蹇，雖未脫唐人夢兆意味，同時也突顯出杜詩奇險瘦硬的一面。對於獨樹一幟的杜詩，在唐代猶是「無聲無臭」<sup>24</sup>，如何入宋而成為詩學主流？「夢境」的介入未嘗不是一個方便之道。

<sup>22</sup> 詳見《蘇學士文集》卷13。《杜甫研究》，頁73。

<sup>23</sup> 趙令畤《侯鯖錄》，《叢書集成新編》本，卷2頁600。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9引《遜齋閒覽》亦記此事，有為文使友人往耒陽弔杜甫墳，更明載狄遵度卒時年方十六。

<sup>24</sup> 王贊〈元英（方干）先生詩集序〉有云：「杜甫雄鳴於至德、大歷間，而詩人或不尚之。嗚呼，子美之詩，可謂無聲無臭者矣。」詳見董浩等編：《全唐文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.12），卷865頁4021。

宋人學杜，除了採編輯逸之外，另外也把工夫則用在箋注上。宋人注杜的風潮固然興盛，其爭議亦自不免，如蘇軾（1037-1101）〈記子美八陣圖詩〉云：

僕嘗夢見一人，云是杜子美，謂僕：「世多誤解予詩。〈八陣圖〉云：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世人皆以謂先主、武侯欲與關羽復仇，故恨不能滅吳，非也。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，不當相圖，晉之所以能取蜀者，以蜀有吞吳之意，此為恨耳。」此理甚近，然子美死近四百年，猶不忘詩，區區自明其意者，此真書生習氣也。<sup>25</sup>

杜甫乃因宋人誤解〈八陣圖〉中「遺恨失吞吳」一句為「恨不能滅吳」，特別現身蘇軾夢中為自己的詩提出辯解，認為圖吳是導致蜀亡的關鍵。顯示已故的杜甫相當在意自己的作品，蘇軾更以此認定杜甫的「書生習氣」。蘇軾雖然與黃庭堅並稱，卻不同於黃庭堅的學杜主張，對杜甫保留比較大的討論空間，更藉由夢境的宣示，呈現出自己與杜甫的習氣終究不同。

王十朋（1112-1171）於乾道元年（1165）移知夔州，有〈初到夔州〉詩，其序稱「夢觀八陣圖」，及至夔，乃「水落沙露，宛然在目。所歷山川，皆少陵詩中景物也。」以夢境與實際景物印證杜甫詩的寫實性，其詩云：

分甘易守不勞麾，夢已先予到古夔。讖語端符楚東韻，忠懷雅合杜陵詩。<sup>26</sup>

王十朋撰有《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》，依創作年代輯錄杜詩千餘首，考訂諸本異同，本極熟悉杜詩，故未入夔已先有觀八陣圖之夢，再加上親臨目睹，更強化杜甫的「詩史」稱號，使杜甫的履跡僻遠山川，都帶有探勘、採風性質。又作〈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〉，復記夢觀八陣之事，且直接以杜詩論斷諸葛亮功績云：「公之生也，能使其君委國託孤而不疑；其沒也，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之石。」<sup>27</sup>使杜詩具有與史書相互參證的位置。

同樣標榜學杜，南宋如何不落入江西詩派的窠臼？是詩人的最大挑戰。四大家之一的楊萬里（1127-1206），其〈誠齋荆溪集序〉自述作詩初學江西詩派，又學

<sup>25</sup> 詳見蘇軾撰，孔凡禮點校：《蘇軾文集》卷 67《題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.9），頁 2101。

<sup>26</sup> 見《梅溪先生後集》卷 12。《杜甫研究》，頁 411。

<sup>27</sup> 同上，《梅溪先生後集》卷 26，《杜甫研究》，頁 413-414。

陳師道五律、王安石七絕與唐人絕句，而「戊戌三朝，時節賜告少公事，是日即作詩，忽若有寤，於是辭謝唐人及王、陳、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，而後欣如也。」<sup>28</sup> 悟後的楊萬里，善於以平易淺近的語言抒寫稍縱即逝的情趣，自成幽默詼諧、活潑自然的詩風，形成獨具特色的誠齋體，錢鍾書以他為「詩歌轉變的主要樞紐」<sup>29</sup>。楊萬里這種轉變，在〈書王右丞詩後〉中有云：

晚因子厚識淵明，早學蘇州得右丞。忽夢少陵談句法，勸參庾信謁陰鏗。<sup>30</sup>

由陶淵明、王維、韋應物到柳宗元，是唐詩發展的主要徑路，楊萬里學詩亦由此進。轉變的關鍵則是夢中杜甫指點的學詩門徑：在句法上要取法南朝的庾信與陰鏗。楊萬里的學詩徑路為何要由唐代轉向南朝？如何在江西詩派的籠罩下自關門徑？在理論建構上很難說得完整，遂採取讓杜甫現身夢中指點迷津的方式，亦可見如何方是學杜真諦？在宋代詩壇已出現了爭議。

無獨有偶，同為南宋四大家之一的陸游（1125-1210），也採取直接夢見杜甫的方式，並且完整地在夢中表達詩學觀念，其〈記夢〉詩云：

夜夢有客短褐袍，示我文章雜詩騷。措辭磊落格力高，浩如怒風駕秋濤。  
起伏犇蹴何其豪，勢盡東注浮千艘。李白杜甫生不遭，英氣死豈埋蓬蒿。  
晚唐諸人戰雖塵，眼暗頭白真徒勞。何許老將擁弓刀，遇敵可使空壁逃。  
肅然起敬豎髮毛，伏讀百過聲嘈嘈。惜未終卷雞已號，追寫尚足驚兒曹。<sup>31</sup>

陸游夢中雖以李杜並舉，惟依「短褐袍」的造型，應指杜甫而言，取自杜甫未仕前在〈醉時歌〉中自道的「被褐短窄」。杜甫主動向陸游出示作品，而陸游也在夢中評論杜甫詩賦，除了肯定修辭技巧上的「措辭磊落」，與風格上的「格力高」，有《文心雕龍·明詩》所稱建安詩「慷慨以任氣，磊落以使才」的特質，更進一步標舉杜詩的「浩如怒風駕秋濤」、「起伏犇蹴何其豪，勢盡東注浮千艘」，以秋水東

<sup>28</sup> 詳見楊萬里：《誠齋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.3），卷 81 頁 84。

<sup>29</sup> 詳見錢鍾書注：《宋詩選註》（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4.9），頁 176。

<sup>30</sup> 詳見《誠齋集》卷 7《江湖集》。《杜甫研究》，頁 641。

<sup>31</sup> 見陸游撰，錢仲聯校注：《劍南詩稿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.4），卷 15。《杜甫研究》，頁 613。

注比擬杜詩的奔騰氣勢，突顯浩蕩豪壯中所展現的速度感。可見杜甫在陸游夢中所揭示的特質，顯然不同於楊萬里夢中所得。此外，不同於宋人極力塑造杜甫忠君愛國的聖者形象，陸游在夢中採取詩與詩人脫鉤的思考模式：詩人「短褐袍」、「埋蓬蒿」的不遇，並不能抹滅詩歌的「英氣」。並且評論晚唐以來詩人的苦吟雕繪，求奇務巧而終究徒勞無功，由此襯托出杜甫的詩歌造詣，即使是晚年的信筆塗抹，如黃庭堅〈與王觀復書三首〉所稱：

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。……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、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。<sup>32</sup>

夔州以後詩的不煩繩削，看似粗頭亂服，仍是耐人尋味，黃庭堅在夢中伏讀百過而益覺肅然起敬。結句有雞鳴夢醒的惋歎，更以「驚兒曹」闡明夢中詩學見解的異於凡俗。

有趣的是，黃庭堅詩學主張建立在學杜上，卻夢見李白，其〈夢李白誦竹枝詞三疊〉序云：

予既作〈竹枝詞〉，夜宿歌羅驛，夢李白相見於山間，曰：予往謫夜郎，於此聞杜鵑，作〈竹枝詞〉三疊，世傳之不？予細憶集中無有，請三誦，乃得之。<sup>33</sup>

黃庭堅以理論建構杜詩學，對李白則採夢境的方式加以補遺，姑不論是否真有其夢？唐宋詩人藉由夢境所透顯的詩學傾向，恰可與時代或個人的詩學主張形成互補關係。

蘇洵（?-?）嘗從陸游學詩，有〈夜讀杜詩四十韻〉，前半記其少從其祖遊宦入蜀讀杜詩事，後半記其長而落拓走四方，夜讀杜詩，有「分明夢見翁，握手一笑倩。殷勤得軟語，意若深予眷」語，詩云：

……那知獨角龍，妙用天行健。至其得意處，力斡造物轉。神雷破潛穴，霹靂飛雨片。武夫荷戈戰，颯沓旗鼓偃。蛟鼉吐波浪，宗廟羅黻冕。鞭車

<sup>32</sup> 詳見黃庭堅撰、黃瑩編：《山谷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5.9），卷19頁184。

<sup>33</sup> 見《黃庭堅詩集注》，卷12頁421-422。

甫平陸，梯磴忽絕巘。又如虛空內，一氣互游衍。有足恣馳驅，不行渠自遠。蒼茫鬼神會，慘慘顏狀變。春榮與秋悴，時節隨晦顯。鳳鳴朝陽桐，諸鳥徒巧轉。《關雎》樂不淫，《小弁》親不怨。此身付天地，寧作青紫植。低頭向嚴武，陵辱非所便。百年稟忠孝，句法老益練。君看夔州作，大冶金百煉。麟經示褒貶，此物足懲勸。蜀山上摩天，蜀水下如線。山川蘊精異，翁句麗而典。荒郊夜徂半，隔巷聞驚犬。分明夢見翁，握手一笑倩。殷勤得軟語，意若深予眷。文章致隆貴，嗤點到羣彥。何當同宗文，相與攜筆硯。<sup>34</sup>

以「獨角龍」比喻杜甫，突顯杜甫的石破天驚、變化莫測的能力，除了具有天行健一般自強不息的特質，甚至於能掌握柄樞而驅駕造物，上天入海，平地拔起，以一氣游衍於虛空之內，有萬鈞之力而又瞬息萬變，所謂「有足恣馳驅，不行渠自遠」，有極高明處，也有極平常處，榮悴喜愠隨心，又都能敦厚而不踰矩。對於杜甫的一生忠孝、一生艱難，蘇洵以「此身付天地，寧作青紫植」加以形容，如杜甫〈夏夜歎詩〉所自云：「青紫雖被體，不如早還鄉」，不為朝廷官爵所拘限，漂泊天地之間，特別是夔州山水的險峻與精異，更與杜甫詩歌成為互文關係。而這樣的杜詩詮解，更在夢中獲得杜甫的認證，以「握手一笑倩」、「殷勤得軟語」的肢體語言，直把蘇洵視為最貼心的讀者，喜得知己之情溢於言表。蘇洵藉由讀杜詩所得的詩歌見解，兼具「清詞麗句」與「碧海鯨魚」，卻顯然向夔州後的大冶之作傾斜，偏向雄奇變化的一面，特別是注意到杜詩的轉換幅度之大與速度之快，都是在直接閱讀杜詩中的深切體會，比較接近印象式批評，在詩話常見的摘句批評與具體考校之外，有其獨到處。

### 三、謁墓所映現的詩學意涵

杜甫晚年漂泊於蜀楚間，最後在湖南結束人生的旅途，留下的最後一首詩〈風

<sup>34</sup> 詳見《冷然齋詩集》卷1。《杜甫研究》，頁784。

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〉云：「十暑岷山葛，三霜楚戶砧」（卷23頁2094），這一段經歷，依元和八年（813）元稹因杜甫孫嗣業之請而作〈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〉所云：

以直言失官，出為華州司功，尋遷京兆功曹。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。旋又棄去，扁舟下荆楚間，竟以寓卒，旅殯岳陽。

杜甫因直言失官後，一再轉換工作地點而終究棄官而去，以致客死他鄉，墓在岳陽之間。以杜甫遠離京城、寂寞以終的晚景，元稹乃藉由〈墓係銘〉跳脫當時政壇宰制與詩壇主流的雙重拘限，賦予杜甫崇高的詩學地位：

至於子美，蓋所謂上薄風騷，下該沈宋，古傍蘇李，氣奪曹劉，掩顏謝之孤高，雜徐庾之流麗，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，尚不知貴其多乎哉。苟以為能所不能，無可無不可，則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是時山東人李白，亦以奇文取稱，時人謂之李杜。予觀其壯浪縱恣，擺去拘束，模寫物象，及樂府歌詩，誠亦差肩於子美矣。至若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，大或千言，次猶數百；詞氣豪邁，而風調清深；屬對律切，而脫棄凡近。<sup>35</sup>

元稹從文學史的視角切入，建構以風騷為源頭、以杜詩為「總萃」的詩學理論，特別標舉杜甫所開創的新局面，使「壯浪縱恣，擺去拘束」的創作旨趣，與鋪陳終始、排比聲韻、屬對律切的詩歌技巧，成為新的詩歌創作指標。

不同於一般詠史詩或懷古詩，偏重在藉古抒懷以體現作者的主體情思，由於「墳墓」本是子孫慎終追遠的一種表徵，一般以清明祭掃來表達對祖先的追思，在情感上對祖先的認同意涵顯然大於自我抒情的表達。至於季札掛劍所映現的重然諾與弔唁知交，則是比較特殊的例子。以此來看唐宋詩人的謁杜甫墓之作，主要出現在晚唐<sup>36</sup>，諷刺詩人羅隱（833-909）在咸通十一年（870）入湖南幕府，次年夏受

<sup>35</sup> 元稹撰，冀勤點校：《元稹集》（底本用影宋抄本《元氏長慶集》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.8），卷56頁601。

<sup>36</sup> 傳為韓愈所作〈題杜工部墳〉，蔡夢弼《集注草堂杜工部詩外集·酬唱附錄》已辨其偽，云：「此退之題工部墳，惟見於劉斧《摭遺》小說，韓昌黎正集無之，似非退之所作。然大曆元和，時之相去，猶未為遠，不當與本集抵牾若是，乃後之好事俗儒，託而為之，以厚誣退之，決非退之所

任衡陽主簿，有〈經耒陽杜工部墓〉詩云：

紫菊馨香覆楚醪，奠君江畔雨蕭騷。旅魂自是才相累，閒骨何妨塚更高。  
駉驥喪來空蹇蹶，芝蘭衰後長蓬蒿。屈原宋玉鄰君處，幾駕青螭緩鬱陶。  
(《全唐詩》，卷 662 頁 7587)

耒陽杜甫墓在岳陽一帶，與屈原、宋玉相近，羅隱認為杜甫的漂泊緣自才高，如杜甫〈古柏行〉所稱「古來材大難為用」，而位卑並不妨杜甫在歷史上的崇高地位。羅隱同樣有不過於世的苦悶，藉由奠祭杜甫墓而上溯屈原、宋玉，成為相互慰勉、自致不朽的詩人譜系。此外，《全唐詩》收錄徐介詩一首，題為〈耒陽杜工部祠堂〉，則杜甫墓旁似乎建有祠堂，詩云：

手接汨羅水，天心知所存。固教工部死，來伴大夫魂。流落同千古，風騷  
共一源。消凝傷往事，斜日隱頽垣。(《全唐詩》卷 775 頁 8785)<sup>37</sup>

以杜甫死葬耒陽的地緣關係，提出屈原的詩人領袖地位，而北國詩人杜甫則以流落不偶的際遇，向南國詞人屈原靠攏，共同結合《風》、〈騷〉而組成不朽的詩人族群。

裴說(?-908?)於天祐四年(907)避難攜眷南下，委居於湖南石首一帶，有〈經杜工部墳〉云：

騷人久不出，安得國風清。擬掘孤墳破，重教大雅生。皇天高莫問，白酒  
恨難平。悒悒寒江上，誰人知此情。(《全唐詩》卷 720 頁 8268)

詩中推許杜甫為「大雅」，將杜甫與《國風》劃上等號，都是以詩歌吟詠著一個醇厚自然的年代，杜甫之死即等同於詩亡，因而對於杜甫的死有著深切的憾恨，甚至發出「擬掘孤墳破」的激動之言，宣洩世亂詩亡的悒悒之情。其弟諧，天祐三年同

---

作也明矣。夢弼今謾錄於此，以備後人之觀覽也。」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)，頁 11。故置不論。

<sup>37</sup> 此詩又見王得臣《塵史》卷中，云：「予熙寧初調官，泊報慈寺。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為詩，見其清苦平淡，有古人風致，不能傳鈔。其〈過杜工部墳〉一詩云：『水與汨羅接，天心深有存。遠移工部死，來伴大夫魂。流落同千古，風騷共一源。江山不受弔，寒日下西原。』」引自《杜甫研究》，頁 96-97。

榜，亦作〈經杜甫墳〉，雖僅存「名終埋不得，骨任朽何妨」二句<sup>38</sup>，亦可見其有意勸解裴說欲起杜甫於九泉的激情，肯定杜甫詩名終將不朽，降低墳墓所帶來的孤寂感。

衡嶽沙門釋齊己（860？-？），與鄭谷、曹松、貫休為詩友，對杜甫墓尤有依依之感，其〈次耒陽作〉詩云：

遠岳復沿湘，衡陽又耒陽。不堪思北客，從此入南荒。旦夕多猿狖，淹留少雪霜。因經杜公墓，惆悵學文章。（《全唐詩》卷 843 頁 9522）

齊己本是湖南人，走過當年杜甫漂泊的路線，體會杜甫如何抱持著對家國的思念，走在自然生態完全不同於北方故鄉的南荒，並且在杜甫墳前表達仰慕與私淑的心意。又作〈弔杜工部墳〉云：

鵬翅蹋於斯，明君知不知。域中詩價大，荒外土墳卑。瘴雨無時滴，蠻風有穴吹。唯應李太白，魂魄往來疲。（《全唐詩》卷 843 頁 9522）

齊己吟詠著杜甫「主上頃見徵，欵然欲求伸。青冥卻垂翅，蹭蹬無縱鱗」（〈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〉）的詩句，質問帝王何以不能重用人才？以致才大名高如杜甫者，只能孤寂地客死南荒異鄉。惟一的知己是同樣才大難用的李白，不同於杜甫〈夢李白〉中「魂來楓葉青，魂返關塞黑」的李白單方面奔波，如今應是兩縷異域孤魂不辭來往奔波之苦，只爲了同病相憐與相互慰藉。齊己又有〈依韻酬謝尊師見贈二首師欲調舉〉詩云：

南國搜奇久，偏傷杜甫墳。重來經漢浦，又去入嵩雲。舊別人稀見，新朝事漸聞。莫將高尚跡，閒處傲明君。（《全唐詩》卷 843 頁 9533）

本詩作於唐亡後，齊己在特意尋找南方特質時，一再爲杜甫墳所牽引，突顯出杜甫在南國的意義與地位，特別是不爲政權所拘限，又非逃世隱居以求高尚，形塑出極爲獨特的詩人質性，是齊己身處易代之際的憑藉。

影響所及，被齊己奉爲「一字師」的鄭谷（848-911），雖未親臨弔謁杜甫墓，其〈送田光〉詩亦云：

<sup>38</sup> 見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卷 13。《杜甫研究》，頁 41。

九陌低迷誰問我，五湖流浪可悲君。著書笑破蘇司業，賦詠思齊鄭廣文。  
理棹好攜三百首，阻風須飲幾千分。耒陽江口春山綠，慟哭應尋杜甫墳。  
(《全唐詩》，卷 676 頁 7744)

鄭谷對於田光的著書、賦詠而攜《詩》流浪五湖，特別叮嚀到了耒陽江口，應到杜甫墳前一哭，顯然是以田光與杜甫為異代同病，藉由杜甫墳前的慟哭，發洩才人志士漂泊不偶的悲情。曹松（830-903？）有〈哭陳陶處士〉，乃直以陳陶為杜甫，詩云：「白日埋杜甫，皇天無耒陽」（《全唐詩》，卷 716 頁 8223），可見杜甫在晚唐已成為詩人不遇的象徵。至於貫休〈讀杜工部集二首〉云：

造化拾無遺，唯應杜甫詩。豈非玄域橐，奪得古人旗。日月精華薄，山川氣概卑。古今吟不盡，惆悵不同時。

甫也道亦喪，孤身出蜀城。彩毫終不擲，白雲更能輕。命薄相如命，名齊李白名。不知耒陽令，何以葬先生。（《全唐詩》，卷 829 頁 9339）

推舉杜甫詩的「造化拾無遺」，可與孟棨論詩史所稱「推見至隱，殆無遺事」相呼應，並以此突顯杜甫詩的超越性，可使「日月精華薄，山川氣概卑」。歷來論創作多採劉勰《文心雕龍·物色》所稱：

若乃山林泉壑，實文思之奧府。……然屈平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，抑亦江山之助乎。<sup>39</sup>

羅隱以地緣關係將杜甫納入屈原的詩人譜系，貫休則以「日月精華薄，山川氣概卑」解構「江山之助」的創作旨趣，從而使杜甫脫離屈原的牢籠而勝出。其二更以杜甫入湖南為「道喪」，最後帶出「不知耒陽令，何以葬先生」作結，呼應齊己〈弔杜工部墳〉的「荒外土墳卑」，認為楚地、楚人都未能為杜甫其人及其詩加分，突顯杜甫自致千古的詩歌成就。

唐宋之際的孟賓于〈耒陽杜工部墓〉，詩云：

南遊何感思，更甚葉繽紛。一夜耒江雨，百年工部文。青山當日見，白酒

<sup>39</sup> 詳見劉勰撰，王禮卿通解：《文心雕龍通解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公司，1986.10），頁 834。

至今聞。惟有為詩者，經過自弔君。<sup>40</sup>

僻處南荒的杜甫墳，只有南遊詩人到此憑弔，並藉由杜甫詩的記憶，發抒今昔之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晚唐五代詩人所憑弔的杜甫墓，共同指向元稹〈杜工部墓係銘并序〉所稱的岳陽一帶，惟序中亦云：「適子美之孫嗣業，啓子美之柩，襄祔事於偃師。途次於荆，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，拜余爲誌。」銘文更明指「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」，則中唐以後的杜甫墓似應在偃師。是以宋人記杜甫墓之作，已分別出現杜甫墓在南方或北方的分歧性，如北宋名相張齊賢（943-1014），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，其〈書杜工部祠堂〉云：

余嘗聞工部死，葬於耒陽縣。縣乃衡之屬邑也。圖經云：工部墓在縣北郭內二里。後晉開運中，縣令黃庭翰重興祠宇。<sup>41</sup>

可見五代時耒陽縣令還爲杜甫重修祠宇，宋初已蕪沒，邑令杜惟一方才修復一新。文中感慨「邑里之民，止好淫祀，而不能設奠于工部之祠」，因此，除了文人的題詩與誌墓祠，張齊賢更以「勸民奉祀」，意圖使杜甫的影響普及於民間。南宋偏安江左，所謁墓祠自然在衡州，如戴復古（1167-?）〈杜甫祠〉云：

嗚呼杜少陵，醉臥春江漲。文章萬丈光，不隨枯骨葬。平生稷契心，致君堯舜上。時號弗我與，毅然抱微尚。干戈奔走蹤，道路飢寒狀。草中辨君臣，筆端誅將相。高吟比興體，力救風雅喪。如史數十篇，才氣一何壯。到今五百年，知公尚無恙。麒麟守高阡，貂蟬入畫像。一死不幾時，聲迹兩塵莽。何如耒陽江頭三尺荒草墳，名如日月光天壤。<sup>42</sup>

戴復古一生不仕，浪遊江湖，以詩四處行謁，特別能體會杜甫的懷抱忠義之心而飢走荒山道，生涯雖然困頓，文章則光焰萬丈。因論杜甫詩歌創作，於當代能夠不畏權勢而筆誅將相，重視詩歌的比興而力救風雅，並肯定杜甫詩具有歷史的地位。更以五百年後的視角，以權貴高塚塵莽而聲迹俱泯，與杜甫三尺荒草墳而名如日月相

<sup>40</sup> 見錢謙益注：《杜工部集·唱酬題詠》引《耒陽祠志》。華文軒《杜甫研究》指此首原無題，頁49。

<sup>41</sup> 見《永樂大典》卷8648 衡字韻。《杜甫研究》，頁54-55。

<sup>42</sup> 見《石屏詩集》卷1。《杜甫研究》，頁789。

對照，以詩歌創作凌駕在政治權勢之上，映襯出杜甫的因詩而不朽。迨至徐得之（?-?），於光宗紹熙元年（1190）官郴州，道耒陽，謁拜杜甫祠，所見乃「孤墳在祠後，祠堂有漢二谷碑，湮漫」，十八年後（寧宗嘉定元年，1208），耒陽邑黃君茂重建祠宇，為作〈重脩杜工部祠堂記〉云：

先生英靈忠義之氣，在天而不在地；文章光焰之氣，在萬世而不在一方。而或者刻舟求劍，欲取證於朽骨，則過矣。<sup>43</sup>

延續戴復古之見，認為墳葬地點與真假並不重要，詩人的英靈忠義與文章光焰自足千古，更明白把「勸民奉祀」導引向「賢而可立教」，而杜甫的「孤墳嶢然，過者起敬」，把杜詩的教化功能落實在施政上。

至於主張歸葬偃師者，如周序〈經少陵墓在鞏縣〉云：

杜陵詩客墓，遙倚北邙巔。斷碣居人識，高名信史傳。猿聲悲落照，樹色翳寒烟。唯有文章在，輝光夜燭天。<sup>44</sup>

周序所見杜甫墓在故鄉鞏縣，且墓碣已經斷裂，相對於杜甫文章所煥發的光芒，杜甫在故鄉的墓顯得十分淒涼。故宋人亦著力於考辨杜甫墓的所在地，如宋敏求《春明退朝錄》卷上即指出：

杜甫終於耒陽，藁葬之。至元和中，其孫始改葬於鞏縣，元微之為誌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，有〈經耒陽子美墓〉詩，豈但為誌而不克遷，或已遷而故冢尚存耶？<sup>45</sup>

宋敏求指出中唐以後杜甫墓的兩種可能：一是但為誌而未完成遷葬，一是已遷葬而故冢尚存。趙令畤《侯鯖錄》卷六則指出：

杜子美墳在耒陽，有碑其上，唐史言：至耒陽以牛肉白酒一夕醉飽而卒，然元微之作〈子美墓誌〉曰：扁舟下荆楚，竟以寓卒，旅殯岳陽。至其子嗣業始葬偃師首陽山。當以墓誌為正，蓋子美自言晉當陽杜元凱之後，故世葬偃師首陽山。又子美父閑，常為鞏縣令，故子美為鞏縣人，偃師首陽

<sup>43</sup> 見《永樂大典》卷 8648 衡字韻。《杜甫研究》，頁 707-708。

<sup>44</sup> 見《宋詩紀事》卷十引《河南府志》。《杜甫研究》，頁 63-64。

<sup>45</sup> 見《杜甫研究》，頁 79。

山在官路，其下古塚纍纍，而杜元凱墓猶載圖經，可考，其旁元凱子孫附葬者數十，但不知孰為子美墓耳？<sup>46</sup>

趙令時以為杜甫墓地當從元稹墓誌，在鞏縣的偃師首陽山。是以南宋徐照（?-1211）〈杜甫墳〉乃云：

耒陽知縣非知己，救危無蹤豈忍聞。若更聲名可埋沒，行人定不弔空墳。  
（《芳蘭軒集》）<sup>47</sup>

把杜甫的死歸責於耒陽知縣，因而在意氣上認同杜甫的歸葬故鄉。至於晚唐人明知空墳而不改其弔，當屬推尊杜甫的形式意義。概括來說，晚唐詩人的弔謁杜甫墳，除了因為地緣關係而使杜甫納入屈原、宋玉的南國詞人譜系，又因為知己之感而使杜甫與李白兩大詩人在「九重泉下盡交期」（見杜甫〈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〉），同時還使杜甫保留北方詩歌總集《詩經》的傳統，有其建構詩人譜系的積極意義。相形之下，宋人顯然更執著於杜甫墳墓所在地的考辨，詩學上的意義並不大。

#### 四、前身：血緣之外的譜系選擇權與爭議性

謁墓的意涵，尚可游走在祖先與前賢之間，「前身／前生」則直接將血緣關係比附到詩學譜系上。相較於血緣宗譜乃命定性的天生自然，詩學譜系的「前身／前生」則屬於自主性的後天選擇。「前身／前生」藉由詩集所表達出來的生命，在後學者對「前身／前生」的心馳神往中，使詩人生命得以不斷繁衍，因而得以建構血緣關係以外的詩學譜系。不同於血緣關係的父權思想，詩人譜系的「前身」則具有自主性選擇權，以白居易為例，不同於韓愈學杜的追築夢想，白居易的學杜乃配合仕宦所作主張，並以「風雅比興」的《詩經》傳統來檢視杜甫詩，其〈與元九書〉

<sup>46</sup> 同上，頁 141。

<sup>47</sup> 同上，頁 785。

云：

撮其〈新安吏〉、〈石壕吏〉、〈潼關吏〉、〈塞蘆子〉、〈留花門〉之章，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之句，亦不過三、四十首。<sup>48</sup>

白居易認為杜甫合於「大雅之作」的作品只有三十幾首，其所標舉的典範作品亦僅五首，都是為戰爭陰影下的無辜黎民百姓而作，因而高舉「歌詩合為事而作」的大纛，且成為新樂府詩的代表詩人。惟創作畢竟是專屬於個人的生命呈現，如加斯東·巴什拉《夢想的詩學》所云：

一本書，是表達出來的生命，因此是生命的一次增長。<sup>49</sup>

隨著「諷諭詩」所帶來的挫折感，白居易的創作生命明顯地向「閒適詩」傾斜，因而在詩人譜系上便選擇以「異世陶元亮」自居，其〈醉中得上都親友書以予停俸多時憂問貧乏偶乘酒興詠而報之〉詩云：

頭白醉昏昏，狂歌秋復春。一生耽酒客，五度棄官人。（蘇州、刑部侍郎、河南尹、同州刺史、太子少傅、皆以病免也。）異世陶元亮，前生劉伯倫。臥將琴作枕，行以鍤隨身。歲要衣三對，年支穀一困。園葵烹佐飯，林葉掃添薪。沒齒甘蔬食，搖頭謝縉紳。自能拋爵祿，終不惱交親。但得杯中潦，從生甑上塵。煩君問生計，憂醒不憂貧。（同上，卷36頁2530）

在同有「棄官」經驗與「耽酒」行爲的詩人中，白居易並沒有選擇以杜甫為「前身」，而在不斷發揮、突顯「閒適」屬性中，完全放棄他所用來苛求杜甫的「大雅之作」，並且刻意選擇以陶潛與劉伶為共同的前身，以「憂醒不憂貧」消解上都親友對「停俸多時」的關心，讓自己從親友網絡轉向詩人網絡。可見詩人譜系的建構，有助於詩人脫離親友的血緣牽制，強化詩人特有的屬性。

有趣的是，白居易在選擇詩人譜系上，乃由杜甫轉向陶淵明，而北宋王禹偁（954-1001）則是由白居易轉向杜甫，其〈前賦春居雜興詩二首，間半歲，不復省視，因長男嘉祐讀杜工部集，見語意頗有相類者，咨於予，且意予竊之也。予喜而

<sup>48</sup> 見朱金城箋校：《白居易集箋校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.12），卷45頁2791。

<sup>49</sup> 詳見〔法〕加斯東·巴什拉著，劉自強譯：《夢想的詩學》（北京，三聯書店，1996.1）。

作詩，聊以自賀）所賦詩云：

命屈由來道日新，詩家權柄敵陶鈞。任無功業調金鼎，且有篇章到古人。  
本與樂天為後進，敢期子美是前身。從今莫厭閑官職，主管風騷勝要津。<sup>50</sup>

王禹偁遇事直言敢諫，屢見擯斥，作〈三黜賦〉云：「夫如是屈於身兮不屈其道，任百謫而何虧？吾當守正直兮佩仁義，期終身以行之。」<sup>51</sup>故詩中首揭命屈道新之意旨，進而賦予詩家可與聖王治理天下相匹敵的權柄，使文學性的流傳千古，成為士人在政治性的當代事功之外的另一種成就。就此而言，近於白居易論詩所標舉的大雅之作，且杜甫、白居易與王禹偁均有關懷黎民的詩作，惟其〈春居雜興〉二首卻不屬於杜甫與白居易所共有的新樂府詩，詩云：

兩株桃杏映籬斜，妝點商山副使家。何事春風容不得，和鶯吹折數枝花。  
（其一）

春雲如獸復如禽，日照風吹淺又深。誰道無心便容與，亦同翻覆小人心。  
（其二）<sup>52</sup>

詩風近於杜甫棄官入蜀後成都草堂時期的作品，如〈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〉、〈絕句漫興九首〉之類，即景抒情，清新自然，又帶有議論性質，故其子以為語意頗有類似杜詩者。而王禹偁則坦言自己選擇的學習對象是白居易，卻藉由佛家輪迴觀來回應與杜甫的暗合，並且帶出以杜甫為「前身」的個人意識。考杜甫卒後次年樊晃作〈杜工部小集序〉云：

江左詞人所傳誦者，皆公之戲題劇論耳，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，當今一人而已。<sup>53</sup>

可見唐人學杜體現在戲題劇論與大雅之作兩部分，而宋初詩風主要有西崑體、晚唐體與白居易體三種<sup>54</sup>，杜甫在宋初則尚未取得詩學崇高的地位，是以王禹偁藉由白

<sup>50</sup> 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纂：《全宋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1.7），頁733。

<sup>51</sup> 王禹偁：《小畜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7），頁6。

<sup>52</sup> 同上，頁52。

<sup>53</sup> 詳見杜甫著、錢謙益箋：《錢注杜詩·附錄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4.5），頁447。

<sup>54</sup> 方回〈送羅壽可詩序〉云：「宋剗五代舊習，詩有白體、崑體、晚唐體。」詳見《桐江續集》（臺

居易而上溯杜甫，在杜甫的戲題劇論與大雅之作以外，另外拈出主管風騷的閒適詩，並以杜甫為「前身」，使杜甫成為宋初學詩的另一典範。王禹偁更在〈日長簡仲咸〉中進一步指出：「子美集開詩世界，伯陽書見道根源」<sup>55</sup>，以杜甫與老子並稱，使詩與道具有相同地位，對於杜甫詩在宋代地位的揚升，具有開啓性的意義。

宋初的杜甫評價猶未脫穎而出，故以杜甫為前身／前生的說法，仍顯得閃躲、迂迴，如蘇軾在〈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贈五首〉中直指孔毅甫為「前生子美」，其三云：

天下幾人學杜甫，誰得其皮與其骨？劃如太華當我前，跛牂欲上驚嵒峯。  
名章俊語紛交衡，無人巧會當時情。前生子美只君是，信手拈得俱天成。  
（《蘇軾詩集》卷22 頁1157）

乍看之下，蘇軾似乎極為推崇孔毅甫的集杜詩，實則意在突顯杜甫的難學而不能，面對杜甫在坎坷顛沛中寫出的名章俊語，後學者猶如站在太華山腳下的跛牂，連攀登的勇氣都沒有，以此來解釋杜甫由唐入宋的依然沉寂。因而藉由集句詩的特性：「用之如何在我耳」（其二）、「左抽右取談笑足」（其四），既不同於創作的嚴謹性，也可以不用考慮原創者的用心與詞意，只要「默誦千萬首」，就可免除「詩人雕刻閑草木，搜抉肝腎神應哭」（其四）的勞神苦思，甚至還能使「退之驚笑子美泣」（其一）。問題是：「千章萬句卒非我」（其五），畢竟只是捨人牙慧的遊戲之作，無關個人情性與寄托，故而蘇軾以「問君久假何時歸」（其一）的提問，隱喻詩歌創作的言志抒情的本質。由此來看「前生子美只君是，信手拈得俱天成」兩句，除了具有反諷的意味，更藉由集杜與學杜的類推，再度突顯出學杜的困難性。因此，蘇軾的自述，也僅以陶淵明為「前生」，元豐五年（1082）躬耕東坡時作〈江城子〉詞云：

夢中了了醉中醒，只淵明，是前生。走遍人間，依舊卻躬耕。（節）<sup>56</sup>

蘇軾對擁有自主性的選擇「前生」，顯然是著重在無常人世中的體悟，與陶淵明有

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0），卷32 頁13。

<sup>55</sup> 《小畜集》，頁61。

<sup>56</sup> 詳見蘇軾撰，石聲淮、唐玲玲箋注：《東坡樂府編年箋注》（臺北：華正書局，1993.8），頁188。

著較高的契合度，與詩學取向的關連性較低。蘇軾在時人學杜的步趨上，顯然抱持著懷疑的態度，因而在以前世今生認定詩學譜系上，借題發揮，以突顯杜詩的不可學。其〈題憩寂圖詩〉云：

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，蘇子瞻、李伯時為柳仲遠作松石圖，仲遠取杜子美詩「松根胡僧憩寂寞，龐眉皓首無住著。偏袒右肩露雙腳，葉裏松子僧前落。」之句，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為憩寂圖，子由題云：「東坡自作蒼蒼石，留取長松待伯時。只有兩人嫌未足，兼收前世杜陵詩。」因次其韻：「東坡雖是湖州派，竹石風流各一時。前世圖師今姓李，不妨題作輞川詩。」文與可嘗云：「老夫墨竹一派，近在徐州。」吾竹雖不及，石似過之。此一公案，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。<sup>57</sup>

李公麟（1049？-1106）與蘇東坡應柳仲遠之邀作畫，蘇東坡畫石而李公麟畫松，合作繪成「松石圖」。柳仲遠要求李公麟以杜甫「松根胡僧憩寂寞，龐眉皓首無住著。偏袒右肩露雙腳，葉裏松子僧前落」詩意，在松根增添龐眉皓首、袒肩露腳的胡僧，成為跨越古今、詩畫互涉的「憩寂圖」。詩句取自杜甫〈戲為韋僂雙松圖歌〉：

天下幾人畫古松，畢宏已老韋僂少。絕筆長風起纖末，滿堂動色嗟神妙。兩株慘裂苔蘚皮，屈鐵交錯回高枝。白摧朽骨龍虎死，黑入太陰雷雨垂。松根胡僧憩寂寞，龐眉皓首無住著。偏袒右肩露雙腳，葉裏松子僧前落。韋侯韋侯數相見，我有一匹好東絹，重之不減錦繡段。已命拂拭光凌亂，請公放筆為直幹。（卷9頁757-758）

杜甫詩乃為題韋僂「雙松圖」而作，畫的主題是兩株古松，杜甫除了極力摹寫畫中古松的蒼勁古奧，讚歎繪畫技巧的神妙，對於在「雙松圖」山水畫中屬於陪襯性質的松根胡僧，杜甫特別用了四句加以形容，以禪僧憩寂與無住所呈現的聖者境界，與古松飽經風雪雷雨摧折而依然蒼勁挺拔的形象，更細膩地捕捉到松子落僧前的一聲輕響的當下，映襯出清淨本然的存在，把「雙松」的具象導向無執無住的「憩寂」境界。從韋僂的「雙松圖」到蘇東坡、李伯時合作的「憩寂圖」，杜甫的題畫

<sup>57</sup> 見《蘇軾文集》，卷68《題跋》，頁2138。

詩扮演了關鍵的角色，因此，蘇轍把蘇東坡、李伯時畫與杜甫詩的巧妙組合，以「前世杜陵」加以縮合，著重在跨時空與跨媒材的交融互涉。姑且不論蘇轍「前世杜陵」一詞的指涉，蘇軾對此一用詞顯然是頗為敏感的，故而著意將之導向繪畫，所謂：「東坡雖是湖州派，竹石風流各一時。前世圖師今姓李，不妨題作輞川詩。」以自己畫風近於文同為例，強調每個人的獨特性畢竟不同，進而以「前世圖師今姓李」，把焦點擺在兩位畫師身上，使韋偃成爲李伯時的「前世」，排除掉杜甫的中介角色。耐人尋味的是，蘇軾更進一步把「憩寂圖」的詩意延伸到王維的「輞川詩」。王維〈偶然作六首〉之六云：

老來懶賦詩，惟有老相隨。宿世謬詞客，前生應畫師。不能捨餘習，偶被世人知。名字本皆是，此心還不知。（《全唐詩》卷125頁1254）

即使以「宿世」、「前生」的詩畫雙兼，仍不免有賦詩之「懶」及以畫爲「餘習」，呼應詩題的「偶然」，處處呈現王維的「無心」，與杜甫的「刻意」自是大相逕庭。再就王維《輞川集》詩二十首來看，雖同樣屬於詩、畫、禪三者交涉的創作，惟輞川詩寫山水空靈，色相俱泯，也與杜甫〈戲爲雙松圖歌〉的極力描摹大異其趣。蘇軾將王維的「前生應畫師」，轉化成「前世圖師今姓李」，使杜甫與韋偃雙雙被排除，這樣的悖離性思考徑路，蘇軾特別要求黃庭堅在題跋後加上按語：

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，流俗人不領，便是詩病。伯時一丘一壑，不減古人，誰當作此癡計。子瞻此語，是真相知。魯直書。<sup>58</sup>

黃庭堅對於蘇軾刻意以「前世」、「前生」、「前身」的糾葛造成「詩病」，乃在突顯李龍眠畫作的集古人之大成而又能自成一家，則蘇軾有意藉由杜甫、韋偃、李龍眠與王維之間的不同跨度，破解時人對「前世」、「前生」、「前身」的迷思，更與其「天下幾人學杜甫，誰得其皮與其骨」的學杜主張相呼應。而黃庭堅肯定蘇軾爲「真相知」的詮解，也與其學杜主張上肯定杜甫兩川詩，特別是夔州後詩的「不煩繩削而自合」<sup>59</sup>，有其隱合處。可見蘇軾看似有意排除杜甫，究其實，仍在

<sup>58</sup> 《蘇軾文集》，頁2138。

<sup>59</sup> 詳見〈與王觀復書三首〉（元符3年，1100），《山谷集》，卷19頁184。

於蘇軾認定杜詩的深刻度，無法以一般性閱讀來理解，更不能僅從字句意義來論究，故而時人所謂學杜，在蘇軾看來，未免都是皮毛。則歷來以為蘇軾對杜甫的關注不如黃庭堅，透過蘇軾對前生／前身的描述，應有重新論斷的空間。而宋人以杜甫為「前身」的依附性，乃能免於泛濫。

## 五、結語

大抵來說，由唐入宋，杜詩逐漸發展成顯學，學杜成為詩壇主流，大量出現有關杜集的輯逸、整理、分類、編年、箋注，以及詩話、序跋、書信中對作品的熱烈討論，論杜與學杜的討論空間很大。本文嘗試從記夢、謁墓與前身等情感徑路切入，闡發唐代詩人以記夢、謁墓表達對杜甫的心馳神往之情，並揭櫫杜詩的廣闊性與多元性，開啓了唐以後學杜的蓬勃發展，更使詩學議題呈現出繁富的多元面向。宋人記夢、謁墓之作顯然較側重在輯逸、箋注、考據等具體層面上，使杜甫其人與其詩相互推激而攀登上詩歌史上的高峰，確立杜甫「詩聖」與「詩史」的地位。再另外選擇以前生／前身的方式，破解唐宋人在議論與考證上的糾葛，避免使「學杜」流於過度浮泛。惟在理論分析之外，選擇記夢、謁墓與前身等非概念性的表述方式，其作用在於欲望與信念的獲取與宣示，如何由此向行動與策略轉化？仍須回歸詩話、箋註、序跋等傳統詩學中加以驗證。

### 參考書目

#### 一、古籍原典

丁福保編：《歷代詩話續編》，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8年。

元稹撰，冀勤點校：《元稹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。

- 王禹偁：《小畜集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7年。
- 方回：《桐江續集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0年。
- 白居易撰，朱金城箋校：《白居易集校箋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。
-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纂：《全宋詩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杜甫著，蔡夢弼會箋：《集注草堂杜工部詩外集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。
- 杜甫著，仇兆鰲輯：《杜詩詳注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0年。
- 杜甫著，錢謙益箋：《錢注杜詩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4年。
- 班固：《漢書》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年。
- 莊子撰，錢穆纂註：《莊子纂箋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74年。
- 清聖祖御編：《全唐詩》，臺北：盤庚出版社，1979年。
- 馮浩箋注：《玉谿生詩集箋注》，臺北：漢京文化公司，1983年。
- 黃庭堅撰、黃螢編：《山谷集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。
- 黃庭堅撰，任淵、史容、史季溫注：《黃庭堅詩集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。
- 陸游撰，錢仲聯校注：《劍南詩稿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楊萬里：《誠齋集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。
- 董浩等編：《全唐文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劉勰撰，王禮卿通解：《文心雕龍通解》，臺北：黎明文化公司，1986年。
- 錢鍾書注：《宋詩選註》，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4年。
- 韓愈撰，錢仲聯集釋：《韓昌黎詩集繫年集釋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7年。
- 蘇軾撰，孔凡禮點校：《蘇軾詩集》，臺北：莊嚴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蘇軾撰，石聲淮、唐玲玲箋注：《東坡樂府編年箋注》，臺北：華正書局，1993年。
- 華文軒輯：《杜甫研究》，臺北：成偉出版社，無出版年月。

## 二、近人專著

車文博主編：《弗洛伊德文集》，長春：長春出版社，1998年。

〔英〕戴維·方坦納（David Fontana）著，李潔修譯：《夢境的例句》（*The Secret Language of the Dreams*），臺北：知書房出版社，2003年。

〔法〕加斯東·巴什拉（Gaston Bacheland, 1884-1962）著，劉自強譯：《夢想的詩學》（*La Poétique De La Reverie*），北京，三聯書店，1996年。

〔美〕魯道夫·阿恩海姆（Rudolf Arnheim, 1904-1994）著，騰守堯、朱疆源譯：《藝術與視知覺》（*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*）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。

〔美〕克里普納（Stanley Krippner）、柏格沙朗（Fariba Bogzaran）、迪卡瓦荷（André Percia de Carvalho）著，易之新譯：《超凡之夢：激發你的創意與超感知覺》（*Extraordinary Dreams and How to Work With Them*），臺北：心靈工坊文化，2004年。

## 三、期刊論文

余光中：〈從象牙塔到白玉樓〉，收入呂正惠編：《唐詩論文選集》，臺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85年。

常思春：〈韓愈論李杜芻議〉，《杜甫研究學刊》2005年第4期。

楊玉成：〈文本、誤讀、影響的焦慮——論江西詩派的閱讀與書寫策略〉，《建構與反思：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2年。

廖美玉：〈杜甫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意義與效應〉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總第94期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。

廖美玉：〈東京與兩川——王安石、黃庭堅學杜的兩種視角〉，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第6輯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。